

■新作聚焦

王松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的月光》: 赋予习见的题材以新意

□刘 颖

王松新作以“流淌在刀尖的月光”作为书名,将“刀尖”和“月光”两个一硬一软、一寒冷一温和的意象直愣愣地摆在读者的眼前。当月光从刀尖流淌过,在凛冽的杀气外裹上一层温软的情感,刀尖的寒光就有了情感的温度。它很好地宣示了这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冷而不寒,尖利而不无情。

莫比乌斯环叙事

2011年5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2012年初,公安部邀请几位作家到“清网行动”的一线体验生活,采访典型案例。《流淌在刀尖的月光》是王松这次定点深入生活交出的作业。都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开始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通俗文艺中烂熟的题材,在新闻尚且余音袅袅的时候,王松如何找到他文学的路径?

《流淌在刀尖的月光》以“我”的追忆和讲述串起了12个并列的故事,小说开始,“我”在追忆自己12岁时身边发生的一起追逃案,负责追逃案的警察是大刘。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因为“清网行动”采访李局长时,发现李局长从相貌到言谈举止都有几分大刘的影子,于是,对几十年前一桩案子的叙述和分析与对几十年后“清网行动”中案例的讲述,自然地在李局长身上形成交汇。

大刘是一个有着现代警察观念和情怀的警察,他的现代观念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大刘的命运多舛也就成为了必然。导致大刘命运悲剧的原因不是“我”讲述出来的,而是借李局长之口说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确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法律无情,这是一个常识,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换一个角度讲法律也有情,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是衡量一个警察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段话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作品从警察的专业素质和人性入手,呈现法的无情和有情,执法者的无情和有情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无情和有情。

小说里,内知视角的叙述人“我”主要讲述大刘抓捕江明往事,全知视角的故事讲述人“我”(作者),负责把听到的、看到的12个抓在逃嫌疑人的故事叙述出来,两种不同叙事视角在“李局长”身上交汇翻折,形成了两个视角的反转衔接,将不同的历史时空对接在一起,以“我”贯穿“李局长”这个翻折点,构成了叙事学意义上的莫比乌斯环,过去的警察和执法理念与今天的警察和执法理念形成了一个无限往复的叙事空间,警察和在逃者既出于法的两端,更是两个鲜活的人。这种结构不是把两个叙事时空简单相加,而是让意义自由生长,取得了1+1大于2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王松为两个叙事者“我”安排了两种叙事腔调,一个呈现故事中叙事者“我”在疑问和思考中对于警察和在逃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对警察这个职业的逐步丰满的认识,这个腔调里有着强烈的作家个人的发现、思考和判断,它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及深度;另一个是讲故事的“我”,负责讲出12个不同的故事,这里的腔调,更多地带有现代说书人的气质,负责为读者讲述12个完整的故事。它负责呈现小说的趣味性,解决小说好看的问题。

两种视角和两种腔调构成了小说的复调叙述,共同塑

造了这部小说的叙事核心:警察和在逃嫌疑人。可以说,小说只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在逃者。在王松的叙事莫比乌斯环里,警察从外延到内涵都是不断变化成长的,在逃者也从扁平的被抓捕对象进化到一个有性情、有血肉的生命体,无论是警察还是在逃者,作家在小说中首先确立的,是他们作为人的形象、性格和情感。《心跳》一章里,年轻警察杜威乔装成小区保安执行抓捕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与业主苏琳互生好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经常无法接听苏琳电话,于是杜威每次把电话放到胸口,让苏琳听他的心跳。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热爱生命的年轻警察形象就这样自然跃出。小说从12个侧面勾勒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性格和命运的走向,真实地呈现了当代警察的立体形象。12个故事里的逃犯,共同完成了关于逃犯这一特殊身份所带来的身份迷惘、性格扭曲、命运转折改变,以及重新塑造自我的难度和可能性。

当然,无论哪种腔调和视角下的叙事,与王松以往的中短篇相比,他的语言和腔调都是节制含蓄的,甚至是有意压抑的,这就使他的作品与当下铺天盖地的警匪、枪战、刑侦等通俗作品区别开来。虽然是讲故事,但目的不仅仅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要呈现出现代观念下的警察形象和基于人的立场的在逃者形象,所以,他克制地处理了作品中戏剧化情节和刺激场面,诸如凶杀、抢劫、强奸等等,作家更在意的,是呈现出警察和在逃者这对关系中,各自的人性、人情、性格和命运的走向和原因。

新瓶装旧酒的新生命

独特的叙事结构无疑是王松拒绝平庸流俗的武器,在小说中发现“人”,则是王松驱动他的武器的深厚内力。由此,他让一个警察抓捕在逃者的烂熟题材,有了王松的气质和深度。小说中,王松首先让作为国家机器一个组成部分的警察,从冰冷的概念到有温度有性格的人。从大刘到杜威,李局长,作家赋予警察这个概念以21世纪的人性和人文的内涵。在“清网行动”中连破九起大案的年轻警察于波,被问及是什么驱动他在这次行动中努力地工作时,他直率地回答:立功。这让叙述和形象塑造更为真实自然。作家更为用心地表现的并不是抓捕过程中警察对在逃者出逃轨迹的推测,而是基于对在逃者之所以亡命天涯的心理的人性化演绎和推演,以及站在人的高度上对生命、对人性的理解。大刘对江明犯罪心理的推演和出逃轨迹的分析,正是立足于从人的性格、情感等层面进入,在尊重人伦亲情的基础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才能成功抓捕。《情殇》里,警察陈大勇能成功劝投外逃的韩桂梅,也是基于他在大量细致的工作后掌握了韩桂梅的心理,于法理和情理上让远逃国外的嫌疑人自愿投案。这不仅仅是法理的博弈,更是心理和智力的博弈。陈大勇也成为现代执法者无情和有情的一个注解。

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是本性善良,在生活和命运的压制或错位中莽撞冲动地激进犯罪的弱小者,《回头》中吴老三那种坚硬的罪犯不多。故此,小说将一个沉重的话题抛给了读者:如何看待罪与罚?

如何理解生命的犯罪和良知道德的自我救赎和自我成长?

《空门》是这部小说中最突出的一章,是作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也是王松写得最为用心的一章。清一是青云观道长,他会医术,还会用一块神奇的石头(砭石)为人治病。每天,清一道长会在观里准备好歇息的地方和茶食,然后开始一天的问诊治疗,这一切都不取分文。清一说,他在青云观里每日云雾为衣、甘露为食,吃的喝的都取自山野,是不花钱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深意。一个父亲送自己叛逆无度以偷窃为乐的儿子到青云观,希望清一道长能帮他教育儿子。当少年问清一,还有什么比钱更好的东西时,清一给了少年一面小圆镜,让他看看镜子,并告诉他,比钱更值钱的就在镜子里面。当过些时日少年离开道观下山时,清一再次把小圆镜放到他的手里,少年没说话,接过镜子就下山了。少年是否明白清一的含义不得而知,作家的用心却是感人而深刻的。

这个受到当地人尊敬的清一道长,俗家名杨永一,原本是个老实木讷的青年农民,被逼杀人后逃到道观里做了道士,每日为义务治病。小圆镜里有什么?自我,一个自由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自我。清一的义务治病既是救治他人,也是自我救赎。犯下罪行意味着从伦理和法理上失去了自我,因此,当警察方伟打通了清一的电话时,清一做完最后一天的义务治病,安心地下山投案了。

清一归案的心态很有代表性,是这部小说中被抓捕者的典型。外逃中的恐惧、担心,因为一时冲动失去理智而犯下的罪行,让这个逃离在外的人永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家,失去了生的乐趣,尽管一直在赎罪,但还是在忐忑担心中度过每一天。甚至,归案时不是沮丧、恐惧,而是心安。《心跳》中的于水根以犯罪手段取得第一桶金后,一直坚持做慈善,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好人。尽管如此却一直生活在忐忑不安中,归案后,他终于可以睡一个属于自己的踏实觉了。与此相类的还有《回头》中的方海、《午夜的阳光》中的申明,等等。由此,清一的小圆镜才具有深意,它告诫世人:保护好自己,不要丢了自我,丢了尊严和自由。

这些弱小者的以暴抗暴或“激情犯罪”,集中呈现了善恶之间脆弱的界线,在弱与强、罪与罚、莽撞冲动和良知道义之间生命的脆弱无助和坚守的艰难,更突出了坚守良善的不易和可贵。

当下文学存在着书写现实的意愿和表达现实的困境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王松擅长用他独特的小说结构方式来处理这类现实题材,此前,长篇小说《红》的结构手法也与此类似。王松创造了一种结构,让他在非虚构写作的现场做起了小说,借由莫比乌斯环穿透现实并超越现实的局限,并由此赋予习见的题材以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旧酒装到新瓶里,新瓶和旧酒一起拥有了新的生命,这是王松的收获,也是他的贡献。当然,新瓶总有变旧瓶的时候,每一部小说都会以它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对于作家而言,寻找到最适合的形式,让新瓶一直新下去,是挑战,是风险,也是乐趣。

不得不说的是,王松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然而,故事讲得太顺畅了,太像一个故事了,没有留给阅读一点难度,可能会导致隐藏在故事后面作家的叙事主旨也顺畅地随着故事流走了。

■创作谈

两个多世纪前,在东普鲁士有一座叫哥尼斯堡的小镇。普莱格尔河的两条支流在这个小镇流过,又汇成一条大河,在小镇的中心形成两个小岛。为出行方便,小镇上的人在岛与岛和岛与陆地之间修造了7座桥。这7座桥中只有一座连接两个小岛,另外6座都通向陆地。一天,有人突发奇想,是否可以一次走遍7座桥,而且每座桥只通过一次,最后仍回到起点?此后,这个问题就成为小镇人们的一个游戏。许多人反复尝试,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后来,20岁的欧拉知道了此事,他将这个问题简化为“一笔画”,并很快用数学模型证明,如果要走遍7座桥,不重复走同一座桥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欧拉在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笔画”不仅为拓扑学提供了一个初等范例,也为小说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如果是小说叙述,欧拉的“一笔画”就可以走通了。小说家在进行创作时,面对的是两个空间,一是写作者讲述的叙事空间,另一个则是故事本身发生的空间。显然,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但这两个空间却应该是拓扑意义的“纽结关系”。当我将后者成功地嵌入前者,使它纽结成一个浑然一体的空间时,我也就可以连续而且不重复地走通“一笔画”,进而完成对所有故事的叙述。这样的结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尽管受到“一笔画”的严格限制,却可以在故事结构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度,由此大大增加了展现的宽度,进而提高表现力。

这一次,我在公安系统深入生活,接触到在“清网行动”中的案例实行行色,几乎可以说每一个案例都很离奇而且不失精彩,警察的性格和个性也迥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几乎是一个个生动的不可替代甚至是不相兼容的独立形象。而面对这样的群像和这样一些故事,如果用传统意义的长篇小说结构显然是很难完成的。这也正是我决定采用欧拉“一笔画”的原因所在。我试图,让我的叙述空间与故事空间“纽结”起来。

显然,在小说意义上,哥尼斯堡的七座桥就是一个个故事空间。这些空间相互之间是无法发生横向关联的,否则人就会掉进普莱格尔河。这些故事空间之间不能发生关联,也就是所谓的“不同场”。即:此故事中的人物与彼故事中的人物,此故事中的事件与彼故事中的事件是不可能有横向联系的,一旦有了这样的联系就会穿越到故事空间之外。故事空间意义的桥梁建立起来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完成“一笔画”的叙述了。故事总是讲述出来的,在讲述的过程中,由于讲述者的视野所限,就需要不停地将视角“翻转”,而这种翻转的过程也是一个拓扑意义的过程。这就好比是一条“莫比乌斯带”,恐怕莫比乌斯,这个德国的数学家绝不会想到,他所发现的这个天才的翻转,竟然为后世的小说家提供了一个全息的视角,也使叙述者获得了比“全知全能”更自由的全方位视野。

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这个“一笔画”走通的问题了。40多年前我认识了一个警察,他也姓刘。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这个“大刘”的形象总是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我从今天这些警察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大刘”的影子,当年的“大刘”在我的记忆中也有和今天这些警察一样的气息。就在我开始准备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时,我似乎通过一条长长的时空隧道看到了站在那一端的“大刘”。他面皮干黄,神情忧郁,却有着一双很亮的眼睛。他正在安静地看着我。于是,我当即确定下来,当年“大刘”的故事,就是我“一笔画”的第一座“桥”。

这样的写作之于我,是一种存储记忆和情感的方式。若干年后,当我再拿出这部小说时,当初曾经深入过的生活以及在这过程中受到的震荡就会跃然纸上。这种存储记忆和情感的方式不仅生动,也可以保鲜。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的写作又重新涉及到有关警察的人物和生活,或者涉及到这一次“清网行动”时,也许我所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几座“桥”,是另外一种形状的“一笔画”。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技术层面与思想层面,应该也是拓扑关系。

□王松

从哥尼斯堡的第一座桥出发

周晓枫:文学修辞主义者的哲学

□张 杰

■看小说

鲍十《东北平原写生集》
对如烟往事的无尽慨叹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钟山》2013年第6期)以“屯”为书写对象,写出了村庄的命运和人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跌宕,令人生发出无尽的慨叹与感怀。

“筐篓洼屯”人世代以编筐篓为生计,然而到上世纪60年代,红柳毁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随之而来的,还有公社派驻的“蹲点干部”齐友林。此人官虽不大,却因“上面有人”而极尽权势。两年零3个月之后的某一天,齐友林突然失踪。县公安局介入调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齐友林被屯里一个平时胆小本分的男青年廉勇给勒死后抛尸荒野,原因是“他缠巴我媳妇儿”。廉勇的媳妇许爱萍“很俊俏”,这个案情并不复杂,侦破过程也很简单,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判决的结果:廉勇杀人偿命,被枪决理所当然,可许爱萍却“被判了一个腐蚀干部的罪,直接送去劳动教养了”。在不起眼的“二天堂屯”里,“举中进士,官至少卿”的周蒙虽学识渊博、精通史经,在官场却并不得志,大半生都在做“候补道”,年过六旬才得到清朝政府的委任,成为“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这使他贪腐的本性变本加厉,受贿时“一捆大葱或一袋土豆,他也会收”。就是这个寡廉鲜耻的人,晚年却有“壮举”:当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动员他“出山”时,他“身着从前的官袍,头戴从前的官帽,足蹬从前的官靴”,悄然吊死在了书房的横梁上。(刘凤阳)

周晓枫的散文集《巨鲸歌唱》让我想到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剔尽人类与人类、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对人性与自我做彻底性的剖析。周晓枫在现实中是一个随和、宽厚而富有幽默感的作家,在《巨鲸歌唱》里却变得冷峻而犀利,把锐利的锋刃近乎无情地指向自己及其经验。因为过多地涉及人性深处的冷酷与绝望,《巨鲸歌唱》更像一个笼罩死亡气息、具有哲学意味的文本,在这里,周晓枫以穷尽自我的方式发出了基斯洛夫斯基式的追问。

《弄蛇人的笛声》用12000多字的篇幅和工笔式的细节描写刻画了一向令人恐惧的动物——蛇。在这篇文章里,以不可救药的修辞主义者著称的周晓枫,极大地放大了自我的恐惧。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冒险的写作,她或许觉得必须借此挖出自己体内的恐惧之根,这也是她对于现实与人性的责任和态度。之前,周晓枫的作品有一种具有现实灵魂的生动感,对我来说充满吸引力,往往是一口气读完才过瘾,但《弄蛇人的笛声》让我

最令人绝望的是《月亮上的环形山》,一

个绝美的舞蹈演员无法忍受残酷的现实逃到国外再无音信,剩下跳伞出身的丈夫——霍叔叔一个人照看一生都要躺在婴儿车里且永远不会长大的女儿。霍叔叔视残疾女儿如生命,随着女儿生命的逝去,他像一枚辛劳一生的树叶一样从生命的枝头飘落了。《弄蛇者的笛声》像蛇吐舌一样“嗖嗖”地吐着恐惧与寒冷,体现一种修辞与思想美学,《月亮上的环形山》则有着人类命运的极端绝望与荒凉,有一种令人心碎的超越人类承受力的文字残酷。在这里,周晓枫把她的修辞主义运用到了极致。

人性深处的恐惧、绝望和寒冷,到底来自人类的原罪,还是因为上帝的冷酷无情?这是周晓枫一直试图表达的哲学命题。月亮是一种近乎奇迹的美丽象征,里面却横亘着坚硬而冷酷的环形山,周晓枫说:“在人睡者的梦境之上,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环形山悬浮半空,那最沉重的同时也是最轻盈的,最优美的同时也是最伤感的……”

好在有一篇以《巨鲸歌唱》为题目的文

章,实现了某种补偿。这是一篇具有精神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尽管这个世界充斥着蓝色的绝望和海底世界般瞬间被毁灭的秩序,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依然需要一种像大海一样的镜像和历史的想象力,它或许会成为人类一种自救的方式与力量之一。

周晓枫为什么不满足于纯粹作家的角色而频频向自我亮剑并逼向这个世界?从这本书的其他篇章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盛年》《夏至》《毒牙》《独唱》《齿痕》等可以说是她精神成长的文字见证。它们是周晓枫含泪的歌唱与成长,从中可以看到她精神蜕变的过程与细节。在《齿痕》里,周晓枫被可恶的牙医误诊进行齿形校正,每天被巨大的疼痛所控制,但她没有把怨恨归结给牙医,而是指向自己对人的轻信和自我状态的恍惚——是什么使她对这个习以为常的世界再一次感到惊讶和不解?

这里必须要看到周晓枫的精神挣扎,周晓枫似乎不得不面对两种力量:一是时代精神所挟裹着的物质主义,二是在以男性作家为主导的圈子里,她必须要面对写作的庸俗主义和话语强权。在《巨鲸歌唱》里,周晓枫没有给自己预留任何余地,像一个在无影灯下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划向自己灵魂深处和这个世界的痼疾。

本报新书邮购:
读者可联系我社
发行部邮购,免邮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农展馆南里10号
6层文艺报社收
邮编:100125
电话:010-65046620
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小说里的中国》为第一、二、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合集,共收入莫言、贾平凹、张抗抗、韩少功、迟子建、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获奖作品24篇,同时收入获奖作品评语及作家获奖感言。(定价:42.80元)
《文学下午茶》收入2012年《文艺报》发表的作家、批评家对话和作家、文艺理论家访谈共35篇,展现了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创作经验和独特体会。(定价:42.80元)
《理论勇气 批评立场》一书收入2010至2012年《文艺报》发表的文艺理论、评论文章77篇,梳理了近3年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的理论热点话题和部分优秀作品。(定价:39.00元)

中山文学院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邮箱:zsb58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广告

朔方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主编 / 哈若蕙
2013年第12期(总第五百三十六期)目录

中篇小说	露丝
------	----